

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



中国天台宗通史

潘桂明 吴忠伟



江苏古籍

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



通史

天台宗

中国

潘桂明 吴忠伟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2

ISBN 7-80643-366-X

I. 中... II. ①潘...②吴... III. 天台宗—佛教史: 通史—中国 IV. B94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227 号

中国天台宗通史

著 作 者 潘桂明 吴忠伟

责任编辑 府建明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开 本 大 32

印 张 26

字 数 6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366-X/B·23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导 言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化、民族化。魏晋时期,在玄学不同流派思想的作用下,佛教在对经典作理解和诠释时,形成多种不同观点,如讨论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这里的“宗”即是“家”,相当于学派,七宗也就是七个学派。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基本上都已介绍到了中国,随着佛教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逐步深入,转而重视讲述佛典,专攻不同的经论,于是出现许多专通某类经论的经师、论师。各师的观点出自对经论“提章比句”的研究,这些还只是在佛教学派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具备宗派的某些基本特点,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形成宗派的客观条件。

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进程,已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准备了条件。陈、隋之际是政治上由南北分裂走向统一的转变时期,天台宗首先在陈、隋之际建立起来。智顗大师创建天台宗的活动是在学派纷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南北朝佛教运动的总结,体现了大一统背景下的社会政治需要。天台宗是最早出现的、意义完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对照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佛教宗派形成的基本条件,如形成独立经营和发展的寺院经济,建立完整体系的学说思想,确保相对固定的传教区域,实施严格的法嗣制度和寺院规范等,天台宗都已经具备。在天台宗确立的基础上,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具有高度思辨、义理色彩的宗派纷纷成立,而在思想领域独具风格的禅宗不久也随之宣告形成。天台宗无疑是中国宗派佛

教的首创者,而它的理论体系的组织规模、思辨水平也在所有佛教宗派中首屈一指,成为中国佛教宗派的代表。



学界对天台宗的学说思想、止观理论体系作出阐述或论辩,迄今已取得若干显著成就,但对天台宗的发展演变作历史性全方位研究、探讨的,则仍然十分欠缺。《中国天台宗通史》作为一种初步尝试,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天台宗这一宗派佛教,是在中国佛教南北朝后期发展的基础上确立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

北魏太武帝以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北方,并建立起“廓定四表,混一戎华”(《魏书》卷四《世祖太武帝纪》)的异族统治。孝文帝在这一基础上通过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加快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进程,使北方地区社会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逐步确立起南北朝对峙中的优势,为北朝最终吞并南朝打下了基础。

南朝自宋武帝至梁武帝,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还足以与北朝相抗衡。但南朝并未抓住有利时机北伐,进而统一中国,相反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以及统治阶级日趋腐败的过程中削弱了自己的力量。534年,北魏分裂(此前六年即528年为“河阴之变”,北魏朝廷内乱,政局已不稳定),这是梁武帝北上进取的良机,但他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久,便发生了侯景之乱,梁朝败亡。陈后主叔宝嗣位后,极度荒淫奢侈,南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南北朝政治上的统一已是众望所归的事。

随着南北朝后期佛教事业的迅速成长和佛教理论的不断演进,所谓“北方重实践,南方重义理”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和弥合,并最终将以实践和义理并重的统一佛教取而代之。就佛教本身而言,它体现为自我认识的深化过程。

北魏在太武帝毁佛前,佛理研究处于初期阶段,禅定修习则比较发达。当道武帝、明元帝相继对佛法表示崇敬时,鸠摩罗什正为后秦姚兴所敬,在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僧八百人译经,宣讲义理。孝文帝远谋深虑,将佛教事业的兴盛与入主中原、巩固统治联系起来,把提倡佛教和推行汉化予以结合。他不仅常命沙门讲解佛经,讨论经义,而且自己“尤精释义”,“手不释卷,顷便为讲”。他的后继者宣武帝也“尤长释氏之义”,常于宫内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他们所倡导的洛阳佛理研习之风,延及北朝后期佛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这表明,随着佛教事业的发展,北朝佛教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注意到佛理与禅习并重的意义。

与此同时,迟至南朝后期,南方佛教在禅法方面也出现了可观的形势。从梁代起,禅法已在江南广为流行,如《续高僧传》卷二〇《习禅篇·总论》谓:“逮于梁祖广辟定门,搜扬宇内,有心学者,总集扬都,较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锺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

上述情况表明,南北朝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南北两地都出现了将义理探讨与禅法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和倾向。这样一种要求和倾向,不仅符合南北朝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而且也为佛教宗派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

第二,天台宗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止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进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使它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当时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也使它在佛教实践方面保持平实稳妥的状态。

天台宗的理论体系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积极的创新。所谓继承,突出表现在修禅实践方面,即以坐禅为核心的程序化严格修行。创新则主要表现在理论思辨体系方面,即以中观学系统的般若性空学说为背景,批判同时代的佛教各家思想学说,结合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有效地确立庞大的新的哲学体系。南北学风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修的紧密联系,使天台宗在早期佛教宗派史上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顽强地生存下来。

天台宗不废禅观,故与后来的禅宗并不一致。禅宗以禅命名,但普遍放弃禅修;天台宗不以禅为标志,但始终坚持禅修。这不只是修行方法上的差别,也是一宗指导思想上的根本不同,故而直接影响到对它们的评价问题。可以认为,天台宗在哲学思辨的水平上不仅远高于世俗哲学,而且也胜出佛教各家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禅宗的优势则在它思想上的积极进取,对佛教思想史的无情反省精神,以及对现实社会人生所取的批判态度。天台宗由于坚持止观双修、定慧并重,主张以“一念无明法性心”为原理的个体修行,辅以各类具体的止观方便法门,因而能满足不同层次信仰者的需求。相对而言,禅宗在重建民族自信和提倡思想解放的同时,在修行上放弃循序渐进方法,导致后来流弊滋生。

第三,天台宗既具有极其高深宏博的哲学理论体系,又不放弃强烈的宗教信仰原则,是密切注意智慧解脱与慈悲济世结合的宗派。

佛教虽然提倡悲智双运,将佛的智慧解脱与菩萨的慈悲精神相统一,但中国佛教宗派后来的发展,则往往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展开;或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转向重智轻悲,或因受特殊社会环境的左右而强调慈悲。天台宗走的是佛教的中庸道路,基本上没有将智慧与慈悲剖为两段。

天台宗的智慧解脱思想,以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为核心命题予以表述,其中不乏般若学说的理论论证,也就在这一意义上,它将自宗定义为圆顿之教。至于天台宗的慈悲精神,则是它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反映,具体落实在忏悔观念、忏法仪规以及净土信仰等方面。

天台宗的忏悔观念、忏法仪规以及净土信仰,对于广大佛教信徒而言,不仅满足了他们对神圣性的仰慕和敬畏,而且也提供了实

际修行的具体步骤。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宋以后天台宗对忏悔礼仪和净土念佛的过度重视,必然造成对后世中国佛教发展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在天台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内在地存在着两条路线、两个层面的发展趋势。就向上的一路而言,天台学者在完成止观修行的同时,注重哲学层面的展开,乃至将“众生成佛”推到“无情有性”的极端,并将“性具善恶”学说的争论贯彻始终。就下行的一路而言,则推动了情绪化、简易化的民众信仰和修行,加速了中国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的进程,从而予近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运动以巨大影响。以天台佛教为首,在宋代已初步完成各宗与净土念佛的结合,将念佛修行、忏悔程序、道场佛事、礼佛仪式等程式化,并使其在宗教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不断上升。

天台宗向下一路的信仰活动和宗教行事,与立宗之初的末法观念紧密联系。从天台先驱者之一的慧思起,该宗就持有强烈的末法观念。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儒、道两家多次连袂对佛教的排斥和打击,乃至通过行政手段对佛教实施的毁灭活动,使早期天台宗僧侣处于末法的阴影之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建立殊属不易,而在此之后不久,其他佛教宗派在帝王的支持下,逐一相继出现,并迅速形成与天台佛教的竞争局面。也就是说,天台佛教在其成长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严峻的现实环境的考验。宋代以后天台佛教对念佛和忏悔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末法的思路,并把对消除末法的影响贯彻到最基本的信仰之中。

第四,佛教的中国化源于印度佛教传入之初,南北朝学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化的初步实现,至隋唐宗派佛教的形成,佛教中国化已取得卓著成效,实际也已暂时告一段落。天台宗是隋唐佛教宗派中最早形成的派别,也是中国化程度十分突出的派别。它的中国化曾给予禅宗的成立以多方面深刻影响。

天台宗之所以取得中国化的重大成就,是因为它具有广泛的

思想文化的融合能力。天台宗学说中的“性具善恶”理论是它与儒学协调的产物。智顗曾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儒家和佛教在很多领域有着共同点,其心性理论是核心部分。他通过对两家心性理论的融会贯通,大谈人性的善恶本具,并以修习善恶来解释人的各种社会表现。智顗以后的所有天台学者,普遍继承这一传统,将儒家心性理论纳入佛家考察范围。

在道家(教)化方面,由于天台宗长期在南方传播,无疑受到南方道教思想和修行的影响。智顗栖隐的天台山,佛道共存,源远流长,以致引起他求觅仙迹,以仙道助成佛道的兴趣。宋代杭州地区也是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兴盛之地,天台宗学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加速对道教的吸收,如道教的仪式轨范、鬼神崇拜都曾为天台佛教的世俗化、民间化予以深刻影响。

第五,天台宗既受末法观念的支配,又遭宗派佛教的排斥打击,所以它的宗派意识表现得比较强烈。

天台宗的宗派意识,首先表现在十分严密的判教方面。从智顗起,天台宗始终维护自宗圆教的优越感,坚持所依《法华经》的特殊地位。智顗之后,天台传人对判教倍感兴趣,不断予以丰富、强化。在这个过程中,天台宗获得了其他各宗的尊重,《法华经》也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地位。

与其他各宗相似,天台宗的宗派意识,也表现在地域性方面。智顗创立天台宗之前,曾得益于陈朝帝王和贵族官僚的全力支持,在金陵地区确立以他为核心的庞大居士集团,随后,又受隋朝官僚群体的拥护,在浙江天台和湖北荆州建立起天台宗的基本道场。天台宗后来的发展,即以这两个地区为中心得以实现,从而形成天台宗的基本地域范围。

金陵传教和天台立宗是智顗王朝正统观念的集中体现。末法意识使天台先驱者慧思的形迹反复南移,最后归老于南岳衡山。智顗受慧思之嘱,入金陵弘法,以辅助南方正统王朝。宋代天台宗

除了在天台的传承,还将宗派地域扩展到当时的京城杭州以及明州(宁波)等地。宋代杭州地区佛教的繁荣发展,与天台宗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有很大关系。

天台宗的强烈宗派意识还反映在该宗内部,其突出表现是宋代开始的山家山外之争。志磐的《佛祖统纪》不仅有排斥他宗的明显意图,而且也有以山家排斥山外的具体记录。

第六,天台宗的传承和演变的历史,是一部佛教宗派的创业史、奋斗史、成长史,它给后人以很多有益的启示。

天台佛教并不像华严宗、唯识宗、密宗等宗派那样,在立宗之初受到最高统治者政治力量的直接支持,发展顺利,无后顾之忧。天台宗在其成立前后即步履维艰,至唐中叶而受其他各宗势力的排斥,又因其始终没有能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宗派力量,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挫折、磨难。但是,天台宗传人前赴后继、香火相续,以坚韧不拔的勇气和毅力,使一宗佛教教义和制度得以维持和传承,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透过天台宗的历史,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

当然,在天台的学说史、思想史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天台学者与其他各宗之间的抗衡、搏击。不用说,智颢当初的教观体系,就是在对南北朝后期各家学说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智颢之后,隋代灌顶、唐代湛然、五代道邃等人,在他们的各类著述中,以发扬智颢大师性具实相学说、天台判教原理为背景,展开对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各宗思想学说的严厉驳斥,以维护自宗的权威。在宋明时期的天台学者中,同样坚持以自宗特有的心性学说(“性具善恶”)的阐述,表达与他宗教义的根本区别。事实上,唐以后的天台学说,多少已吸收了《起信论》“真如不变随缘”思想、华严宗“性起缘起”说,但强烈的宗派意识决定天台学者保持与他宗的对峙。即使宋代内部“山家”“山外”之争,其意见的可靠性、真实性,也要以是否坚持自宗固有立场为标准来衡量。这种以“排他性”表

现的思想斗争,很大程度上也是该宗自强不息精神的组成部分。

在所有佛教宗派中,虽然天台宗的地域规模并不很大,也并不为历代统治者最为看好,但它能血脉相承、绵延不绝至于今日,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中历时最为久远的一派,除了其思想学说,以及方法、策略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得益于这种精神。

二

天台宗的历史,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酝酿和成立时期——陈、隋。

天台宗酝酿于陈、隋之际,成立于隋初。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智顗,而在智顗之前,北方慧文、慧思两代禅师以禅法递相传承,成为天台宗的先驱者。

慧文的宗教活动大约在北朝魏、齐之际。据《续高僧传·慧思传》等资料可以推断,慧文是在北方地区聚徒坐禅,且有一定影响的禅师。结合《摩诃止观》卷首灌顶所说“文师用心,一依《释论》”,证明他主要依《大智度论》的大乘空观立说,并以此指导禅修。

慧思早年是一名严守戒律、注重苦行的北方禅僧,他与其他禅僧的主要区别,是以《法华经》为所依;通过对该经的持诵,为后来开悟“法华三昧”奠定基础。在见到慧文之后,他开始转向对“观”的重视,在大乘空宗般若思想的引导下,并通过对“心”的观察思维,终于开悟“法华三昧”。其后,慧思经河南兖州,南移至光州大苏山。在光州,慧思受大众之请,讲说《般若经》和《法华经》,开创了将《般若》的中观学说与《法华》的实相理论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同时,他还严格实修止观,定慧双开,为天台宗的成立准备了条件。道宣《慧思传》指出,慧思禅学的特点是“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所谓“昼谈义理”,是指弘扬佛教理论;“夜便思择”,则指具体的禅定、止观实践。这表明,慧思在地域转移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北方佛教

重视禅定实践的风格,又吸取了南方佛教注意玄理的传统。

智颢出家后投慧思受学,为慧思所偏爱。慧思南下衡山隐居前,令他前往金陵弘法,并特别教诫说:“汝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这一教诫影响了智颢一生的思想和行仪。

智颢在金陵时期,来往于金陵和天台、荆州之间,为创立天台宗作不懈的努力。他的创宗活动从两个基本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宗派哲学理论体系,二是制定一宗教戒仪轨制度。在智颢圆寂之前,宗派规模大体形成。《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三大部”构成天台宗哲学理论的庞大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在所有中国佛教宗派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决不逊色于迄今所有哲学建构。智颢所制定的各项寺院规范、礼仪制度,则为尔后所有佛教宗派提供了制度层面的范例。

由智颢确立的天台宗理论体系,主要内容是以“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止观学说。

止观,系禅定和智慧的并称。当南北朝止观被析为二途的同时,已孕育着统一回归的要求和趋势。智颢的杰出贡献,就是将慧文、慧思所开创的止观双修予以体系化,组织成自宗的理论纲领。

智颢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性具善恶”说。此说为天台后学继承和发扬,成为该宗的一大特色。按照大乘佛教的一般观点,“性”或“理”是纯粹至善至净、超越善恶对立的精神世界。如果说它是“善”,这种“善”并非含有与“恶”对立的意义。所以,大乘佛教通常不说“性善”,更不说“性恶”。智颢提倡的“性具善恶”说,尤其是其中的“性恶”说,为佛教的中国化写上了重要的一页。

智颢时代,南北佛学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智颢不仅通过“止观”学说从哲学理论上圆融统一了南北佛学,而且通过判教教系统一安排佛教全部经典,调和佛教内部矛盾。智颢的判教理论,由五味根机说、三种教相论、四教义说、教观统一论等组成。他还把判教理论中的三种“教”与止观学说中的三种“观”配合,构成“教观一

致”体系。但天台后学对智顗的上述判教思想,通常以“五时八教”说予以概括,作为天台宗判教理论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智顗当初的原意。

第二,发展和守成时期——唐代。

智顗的门徒很多,最为重要的是灌顶,智顗的思想多经他的传播才得以流传。智顗作为天台宗的创立者,著述宏富,但亲笔撰写的只是其中极小部分,其余主要由灌顶根据讲述整理而成。灌顶在天台宗创立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他同时还是天台宗荆州玉泉寺的首任住持。以国清寺为中心的天台佛教主流的发展,以及以玉泉寺为代表的另一天台佛教系统的确立,都与灌顶的努力分不开。但是,或以为天台宗是由灌顶和智顗共同创立的,则显然夸大了作为弟子的灌顶的作用,而且也将造成对智顗的客观历史地位的否定。

灌顶之后,因其他各宗势力兴起,国清寺系统的天台宗没有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玉泉寺系统的天台宗却有较大的发展。开皇十七年(597),灌顶接掌荆州玉泉寺。与灌顶同时,并出于智顗门下的玉泉寺天台宗禅师,尚有普明、道悦、行简、德抱、道势、法论、法偃、法盛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玉泉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灌顶之后玉泉寺天台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唐代有弘景、惠真等禅师。在弘景、惠真时代,玉泉寺的天台佛学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显示出与天台国清寺系统不同的风格特色(兼修律学、念佛等),并在事实上作为天台佛教的支派长期传承下来。

中唐时,智顗五传弟子湛然担负起了“中兴”的重任。湛然为了摆脱当时天台宗的困境,在理论上作出新的尝试。他特别针对华严宗只承认“有情有佛性”之说,在《金刚錚》等著述中提出了“无情有性”说。认为,即使没有生命的东西,如墙壁瓦石等,也都具有佛性,都能成佛。除了《金刚錚》,他还著有《法华玄义释签》、《止观辅行传弘决》、《法华文句记》、《止观义例》等多种,对智顗的学说给

予新的阐述,推进天台佛教义理的发展。

湛然的“无情有性”说,发展了道生的“一阐提皆得成佛”思想,进一步扩大了成佛范围,对佛教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它补救了佛性不具普遍性,统辖范围有限的缺点,试图把整个世界纳入佛性的支配之下;另一方面,它又势必破坏佛性的至高无上的尊严性,在佛教内部引发新的危机(可见之于后来的禅宗)。

湛然传道邃、行满,时有日本僧侣最澄及其弟子义真来华,向道邃、行满求学天台教义。学成归国后,最澄在比叡山开创日本佛教的天台宗,这是天台佛教对日本佛教的重大贡献。

唐末五代,中国佛教经历多次劫难,除禅宗一枝独秀外,其他各宗普遍走向衰落。天台佛教也因教典散佚殆尽而陷入困境,至宋初已是“讲习教义中断,正统承传不明,故各呈所见”(项士元《浙江佛教志·天台宗》)的局面。

第三,维持和论争时期——宋代。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宋代佛教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宋初,天台僧侣义寂通过禅僧德韶,敬请吴越王钱俶遣使海外访求教典。不久,高丽沙门谛观带来大量天台宗以及其他各宗的论疏和著作,使天台佛教再现复兴之机。义寂也因此而被天台宗人视为湛然之后又一“中兴”有功之人。

受上述事件的推动,宋代天台宗以杭州等地区为中心,涌现了一批义学高僧。与此同时,又因受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天台宗学僧内部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关于智顗所著《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涉及到观心方面的“真心观”或“妄心观”的理论分歧,并由此引发天台宗内部“山家”、“山外”的分裂。这些方面,实际上都与时代的变化相联系,可以通过文化史和思想史的阐述获得圆满解释。

宋代天台宗的基本走向,除了理论方面对“真心观”、“妄心观”等义学命题的反复争论,在具体修行实践方面,普遍发展了智顗所

倡导的念佛三昧,以与当时教界盛行的弥陀净土信仰接轨,从而在天台宗内部,纷纷展开台净合一或台禅一致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对推动佛教在宋代以后的净土化转向起了很大作用。同时,随着净土念佛的推广,为满足广大信众的信仰需求,宋代天台宗致力于完善智顗初制的仪轨制度,尤其是水陆法会和各种忏法。

事实上,天台佛教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线路、两个层面展开。这是它能够传承久远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是它不断世俗化的客观条件。

第四,回护和退守时期——元明清。

天台宗在式微过程中,历代仍有一些高僧出现,如元代有性澄(著有《金刚经集注》、《弥陀经句解》)、蒙润(著有《天台四教仪集注》)、怀则(著有《天台传佛心印记》)、允若(著有《内外集》)、必才(著有《法华讲义》、《涅槃讲义》)、善继等,明代有真觉(著有《楞严百问书》、《法华披荆钺》、《净土梦谈记》)、传灯(著有《净土生无生论》、《性善恶论》、《法华玄义略辑》、《天台传佛心印记注》、《楞严经玄义》、《楞严经圆通疏》、《净土法语》)、智旭(著有《教观纲宗》、《教观纲宗释义》、《法华经会义》、《法华经纶贯》、《大乘止观释要》等),清代有受登、灵乘(著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纶贯》)、灵耀(著有《楞严经观心定解》、《四教仪集注节义》)、内衡、性权等,相承不绝如缕,使天台之学得以延续至今。但是,时代愈后,天台学者的思想也愈混杂,这从他们的著作范围也可得知一二。

第五,命脉维系时期——近代。

自明代智旭创立兼修净土的“灵峰派”起,天台宗的净土会归倾向更为明显。至近代,天台学者普遍重视净土念佛实修,而于天台教义的发扬光大则益显薄弱。

近代天台宗学者较为著名的有观竺、广昱、幻人、通智、敏曦、祖印、谛闲等。他们的天台佛学大多与禅或净土相联系,与近代中国佛教的总体趋势相合。谛闲是灵峰派的传人,堪称近代天台一

大家,但他也只是“行归净土,教演天台”,并于教、禅、净三者融会贯通。其著作有《教观纲宗讲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昧疏》、《圆觉经讲义》、《普贤行愿品辑要》、《观经疏钞演义》、《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大乘止观述记》、《始终心要解略钞》,门人辑有《谛闲大师全集》行于世。谛闲平时讲经,或说《法华经》,或说《楞严经》,或说《弥陀经》,或说《圆觉经》。据传他律己甚严,每日必自得佛号一万遍。

但在谛闲之后,其弟子各化一方。宝静继主宁波观宗寺;倓虚于东北创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又于青岛创湛山寺,也取“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之旨。

无论是谛闲还是倓虚,虽说对“中兴”天台已竭尽全力,但总体上说,近代的天台佛教也只是维系一息命脉而已。

三

中国天台宗的历史,与其他各宗相比,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所以在撰述方法上,我们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要关注到天台学说思想的特殊性。

中国宗派佛教有八宗(天台宗、三论、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禅宗)之说,其中有重视义理的,也有关注实修的,还有义理与实修并重的,天台宗在八宗之中当属义理与实修并重的一派,并且在两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和突出表现。

天台宗的哲学深度及其思辨水平在全部佛教宗派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智顗所创建的天台学说体系,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世俗哲学,而且也在佛教哲学中独占鳌头,直接影响到尔后建立起来的三论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思想理论。天台佛学提出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命题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为中国哲学从朴素的伦理道德学说向精致的思辨哲学、本体论哲学的转向提

供了重要思想资料。智顗大师的“一念三千”说是对中国哲学的重大革新,在哲学形态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智顗大师的“性具善恶”心性理论,也将传统儒家的人性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遗憾的是,天台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至今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认识,这对我们的先哲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真正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毫无疑问,天台宗通史的写作,首先要对该宗的学说思想以充分的重视,将它的哲学理论部分作为通史的主体和核心,作出严密、准确的阐述,并予以客观、如实的评价。

2. 天台宗虽以哲理见长,但作为佛教宗派,在实修层面上同样十分注重。如何使这两方面的叙述符合实际,恰到好处,是必须予以重点考虑的。

天台宗强调止观并进、定慧双修、学行一致、教观统一,十分注意两者的平行发展,这在八宗之中并不多见。在天台宗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基本上始终不忘两个层面的展开,致力于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超越性与现实性、哲理性与实践性、般若智慧与神性追求、法性与无明、空性与忏悔、止观与念佛、净土与尘世。

从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开始,该宗就意识到宗教礼仪规范对宗派佛教的重要性,所以建立起受戒、忏悔、坐禅、礼佛、念佛、放生等一系列严格的仪轨制度,以保证宗教信仰的落实。天台佛教不像后来的禅宗那样,否定一切修行,抛弃所有礼仪,终于走上呵佛骂祖的极端道路。因受基本礼仪规范的约束,天台宗历史的发展并未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天台宗的仪轨制度,不仅对天台宗自身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对其他宗派具有借鉴意义。宋以后的天台宗,因受理学思潮的制约,哲学理论的发展已举步维艰,忏悔、念佛、放生、法会等行事礼仪被突现出来,并为其他各宗所纷纷效仿,对尔后中国佛教的走向提供了样本。